

从浪漫的质疑到自我的否定：鲁迅对启蒙的反思

李美容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株洲, 412007)

摘要: 鲁迅早期主要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 对现代西方文明扼杀人的个性、禁锢人的心灵进行了批判。中后期, 他着眼于中国社会现实, 对启蒙价值观念引进到中国后产生的移植性、空幻性问题进行了思考。鲁迅还对自我的启蒙者身份进行拷问, 批判了启蒙者的偏执与狂热, 揭示了启蒙者被迫放弃启蒙无路可走的处境。

关键词: 鲁迅; 浪漫主义; 启蒙; 《狂人日记》; 《新生》; 五四运动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2-0165-05

鲁迅是一个启蒙者, 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 这是毫无疑问的。鲁迅面对顽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封建传统, 面对愚昧、麻木、自私的国民灵魂, 面对因循守旧、野蛮血腥的社会现实, 发出了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他一加入新文化阵营, 就成为最有力的启蒙干将。即使在新文化阵营风流云散后, 鲁迅仍坚持启蒙主张, 终其一生, 都不曾卸去肩上的启蒙重担。可就是这个最坚定、最顽强的启蒙者鲁迅, 一直持续不断地对启蒙本身进行着拷问。一边执著地进行着启蒙工作, 一边怀疑和反思着启蒙行为, 痛苦、绝望而又无比坚韧。因而, 鲁迅的启蒙较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 更持久、更深刻。鲁迅不仅超越于现代中国其他启蒙者之上, 更不断超越自身, 超越了启蒙者鲁迅自己。

一、浪漫的质疑

鲁迅对启蒙的怀疑和反思, 最初是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姿态表现出来的。

从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的百余年间, 以法国为中心, 启蒙运动的思想狂飙席卷了西方, 带来了一系列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启蒙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思想革命, 它所带来的现代文明是令人惊异的, 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在它面前黯然失色, 成为落后、蒙昧的象征。启蒙者毫不怀疑地认为, “我们正在进步, 我们正在发现, 我们正在摧毁古老的偏

见、迷信、无知和残忍, 我们正在建立某种科学, 以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自由、道德和正义”。^{[1][26]}民主、科学、理性、进步等启蒙价值和观念, 直到19世纪初都未曾受到过任何怀疑。

是浪漫主义者最先打破了启蒙的迷梦。他们看到, 启蒙主义者对理性的推崇, 导致了理性与感性的分裂, 人的形象被严重地扭曲; 民主、自由、平等观念, 在扫除封建特权、宗教神权的同时, 伴生了现代科层体制, 形成了对人进行新的奴役的牢笼; 科学技术、工具思维极端发展的结果, 使整个世界对象化, 失去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写道, “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 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说明, 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2][65]}浪漫主义者推崇人的情感、想象和意志, 反对把人的理性与感性割裂, 强调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追求无限和永恒, 呼唤回归自然, 返回人的自然本性。浪漫主义者的主张, 对启蒙运动起到了反思和纠偏的作用。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 中国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 在不断落后挨打的处境下, 西方现代文明从器物到制度, 再到思想观念, 被一代代启蒙者视为救国良药。即使到了五四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现代文明受到了西方社会继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更严厉的质疑与批判, 五四一代许多启蒙者在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理性、人权等价值观念时, 仍然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这些观念是以一种“真理”的身份进

收稿日期: 2011-07-11

作者简介: 李美容(1975-), 女, 湖南桃江人,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入启蒙者的精神世界的。同是五四启蒙者的鲁迅没有将西方的启蒙观念与价值视为真理。早在1907年,鲁迅就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立场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审视。

鲁迅认为“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3](50)}西方文明,自启蒙运动以来,对中世纪文明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而产生不可避免的弊端。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指出英法等国启蒙运动以来,“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3](49)}鲁迅没有随声附和,大唱赞歌,而是进行了冷静地分析。他认为,平等、自由、民主等启蒙价值观念在西方的普及确立,是“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流”,其弊端是“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3](49)}人的个性、独特性,就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幌子下遭到了扼杀。更进一步,鲁迅看到民主、平等启蒙观念,不仅仅会扼杀个别人、个别天才的个性和独特性。而且还会使整个社会沦于庸常,失去活力,“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3](52)}所以,对于急于摆脱封建专制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启蒙观念可能带来的是另一种专制,又会使之沦为新的庸众。

针对19世纪重物质轻精神,导致社会的功利化、人的物化和异化这另一大潮,鲁迅对启蒙运动另一弊端进行了反思批判。伴随着启蒙运动对科学的推崇,对工具理性的强调,物质财富在以几何速度增长,而人的精神世界却出现了荒芜,以至于人在这个陌生的、异己的物质世界,找不到精神安顿的家园,产生了无家可归感。鲁迅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对此早就有了警觉。“盖举世惟知识是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3](65)}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其弊端又是对人的主体性、个性的扼杀,并且愈演愈烈,将使整个世界精神枯萎。“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端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3](54)}被工具理性所控制,整个世界包括人自身都被客体化、物质化,人已不能称其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世界也将失去它的丰富和神秘,那么社会只将剩下虚伪和罪恶。“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盟,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暗淡”。^{[3](54)}启蒙运动所导

致的人的物化,社会的功利化,后果如此不堪设想,如果科学、理性等启蒙价值和观念不加审视就盲目引入中国,结果会怎样呢?鲁迅指出:“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3](58)}所以,结局只会是更快地灭亡。

鲁迅认为,要救中国,固不可沿袭原来的老路,也不可盲目照搬西方,将启蒙思想观念原封不动地引进来,依葫芦画瓢,而必须做出自己的决断,经过一番反思批判,“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以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3](57)}可见,鲁迅是站在肯定人的个体性、主观性、超越性的浪漫主义立场,对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等启蒙价值观念进行批判与分析的。他所欣赏的,不是匍匐在启蒙价值观念下的庸众,也不是封建专制宰制中的奴隶,而是“刚健不挠,抱成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3](101)}具有自由意志、独立个性、不断反抗的精神界之战士。

二、现实的批判

鲁迅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在他早期留学日本时,主要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纵观整个西方现代文明,对其的扼杀个性、禁锢心灵进行了批判反思。正由于有早先对启蒙的浪漫反思,使鲁迅对西方现代文明保持了警惕,而没有像其他启蒙者那样,将启蒙视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对启蒙怀着乐观的憧憬。尤其在经历了《新生》杂志创办失败,回国后“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4](80)}对启蒙弊端的清醒认识,加上亲身经历的启蒙失败,和对中国现实的洞察,使鲁迅根本鼓不起启蒙的热情。虽然,他听从了金心异的劝说,加入了《新青年》的启蒙阵营,虽然在《新青年》解散后,只有他仍然坚持启蒙道路,及至十多年后,阶级斗争观念盛行,许多人宣布鲁迅过时了,可他仍抱着“启蒙主义”不放。但是,在从事启蒙工作的同时,他对启蒙的批判反思也从未停止过。继早年他对启蒙的浪漫批

判之后，他回到中国，在从事启蒙工作的同时，他对启蒙的反思主要站在现实主义立场，在启蒙观念引进中国后，对启蒙价值的移植性、空幻性进行了思考。

鲁迅对启蒙的现实批判，首先着眼于启蒙价值移植到中国后的变形甚至于产生相反的作用。他曾提到“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5](506)}所以民主成了统治者独裁的口实，自由成了戕杀学生、平民、进步知识分子的任意，科学成了中饱私囊的工具。“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6](615)}甚至有可能更坏。自从民主、自由的气息吹进中国来，“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7](70)}于是有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有这个军阀那个军阀的混战，有“革命，革命，革革命”。启蒙的药方非但不能使垂死的中国起死回生，反而加速了痼疾的恶化，加速了自身的溃烂。可以说，启蒙移植过来后因水土不服，导致了更加残暴的专制，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是一次又一次更血腥的杀戮；启蒙导致了更愚蠢的蒙昧，革命者的血被当成治病的药、一条辫子就能在乡村引起轩然大波；启蒙导致了精神的进一步奴化，正人君子成了帮闲的帮闲、学者文士露出了“叭儿狗”的丑态。

在中国社会未作整体变革，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启蒙思想观念传到中国，只会变得面目全非，沾染上“鬼气”与“毒气”。竹内好认为，“面对自由、平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道德的输入，鲁迅进行了抵抗。……把新道德带进没有基础的前近代社会，只会导致新道德发生前近代的变形，不仅不会成为解放人的动力，相反，只会转化为有利于压制者的手段。”^{[8](147)}当中国其他启蒙者热烈欢呼“德先生”和“赛先生”时，鲁迅对启蒙的反思，不仅不是落后的表现，反而显示了鲁迅的前瞻性和超越性。

鲁迅对启蒙的现实批判，还体现在揭露启蒙理想的空幻性。面对中国现代其他启蒙者将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当作真理顶礼膜拜的情况，鲁迅却指出这些价值观念在目前的中国只是虚幻的观念和无法实现的理想。

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借“N先生”之口，指出了辛亥革命后社会依然如故，“懒洋洋”的“国民”已不记得双十节，更不记得为民主、共和理想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启蒙者，“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3](488)}启蒙者以惨重的代价，换来的唯一成就竟是剪了辫子的人在路走不再被人笑骂

了。付出与回报相差如此悬殊，反映了当时中国根本不具备接受启蒙价值的土壤这一现实。“N先生”质问启蒙理想家，“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他认为“启蒙理想家的一切努力，只不过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3](488)}启蒙者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目标，只可能出现在预约的黄金世界里，无法在当时的中国兑现。

鲁迅还以小说《伤逝》，进一步警示人们对启蒙价值不要迷信和盲从。小说《伤逝》里的涓生在子君面前是一个拥有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启蒙者，并且一直以这套观念引导她、评判她，以一个真理代言人自居。他先以这套思想观念，唤醒了子君，“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9](114)}子君在涓生的启蒙言说下，认识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9](115)}她不顾世俗的嘲笑，不顾家庭的反对与涓生同居了。可是同居不久后，子君只忙于做饭、喂鸡等琐碎的家务，以涓生那套启蒙观念衡量，她的所作所为毫无价值，她的精神境界非常平庸。涓生失业后，只忙于无聊家务、与小官僚太太吵架的子君，根本不符合他的那套启蒙观念，因此也不值得他爱了，并且还感到子君成了他生存的累赘。他明知抛弃子君，子君只有死路一条，可他还是以那套平等、自由的启蒙话语为幌子，以“我已经不再爱你了”为借口，要逼走子君。此时，涓生也感到了自己启蒙话语的虚伪，“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之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9](126)}涓生以那套美丽的平等、自由启蒙话语，诱惑了子君，接着又用它否定了子君，最终还利用它抛弃了子君。涓生因那套启蒙话语的光环，获得了子君“热烈、纯真”的爱，最后又毫无怨言地离开了他，自己去死。如果取下那个美丽的启蒙话语光环，我们发现涓生其实只剩下胆怯、自私、冷漠、残酷和虚伪。这样一个人，只会空谈平等、自由，不但担负不起启蒙的任务，相反还会使启蒙走向反面。

通过涓生这个启蒙者，鲁迅深刻揭示了启蒙价值观念的空幻性，在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自由、平等插足的余地，对它的盲从只会导致悲剧的发生。实际上平等、自由的启蒙思想观念自五四以后，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霸权，赞同附和者被视为进步，反之视为落后反动，而许多伪君子借自由平等之名大行营私舞弊的勾当。鲁迅通过《伤逝》，告诫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不要对西方启蒙观念迷崇，否则启蒙者将在

无意中变成谋杀者,而被启蒙者只会像子君那样被剥夺话语权力,甚至生存的权力。

三、自我的否定

鲁迅对启蒙深刻的怀疑,还体现为对启蒙者的自我否定。“历史上的启蒙主义者几乎都是乐观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言说的就是真理,预约的就是未来”。^[10]鲁迅却是一个深刻的悲观主义者。他用解剖刀解剖别人,更多的是解剖自己,尤其是那个启蒙者鲁迅。他在别人乐观地看到希望的地方,他看到的是“铁屋子”般万难破毁的绝望;他在别人以真理在握的姿态,俯视民众时,他却清醒自觉自己绝非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是一个坚定的启蒙者,却又对启蒙者身份不断地自我怀疑与批判。

在鲁迅小说中,启蒙者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狂人、疯子,一类是孤独者。《狂人日记》《长明灯》里的启蒙者形象都是精神不大正常的人。《狂人日记》里的启蒙者某君,患有迫害狂症,在他看来村里的赵贵翁、佃户、老中医、大哥,都满眼凶光,“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3](445)}都在找机会要吃他。《长明灯》里的启蒙者,一心要熄灭吉光屯社庙里的那盏长明灯,他认为吹熄了那盏灯,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他的眼睛中,“略带些异样的光闪,看人就许多工夫不眨眼,并且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9](59)}面对别人的阻劝,“忽又现出阴鸷的笑容”。当他想到用放火这法子以熄灯时,“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寻,仿佛想要寻火种”。^{[9](60)}无论《狂人日记》还是《长明灯》里的主人公,都呈现出一副心智失衡、理性失控的状态。鲁迅将启蒙者塑造成狂人、疯子,用意是深刻的。一方面,鲁迅看到,历史上那些反抗现状、不满奴役的先行者,统治阶层容不下他,普通群众不能理解他,往往会被大家罩上一个名目杀掉,这是中国历史的老谱。对于一个要触动乃至激烈否定封建传统的现代启蒙者,更不能见容于社会,所以会被视作“狂人”“疯子”。《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不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3](447)}由此可见,鲁迅将启蒙者塑造成狂人和疯子,是对启蒙者真实历史处境和命运的洞察。《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没有被吃掉,是因为“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他放弃了启蒙立场,得以继续容身于传统社会。《长明灯》里的疯子,因一再执著地要熄灭那盏长明灯,而被村

人诓骗、嘲笑,最后被关了起来。另一方面,鲁迅将启蒙者塑造成狂人、疯子,更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启蒙者本身具有的盲目、偏执、狂热等致命弱点的批判与反省。中国现代启蒙者,从西方学到了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就以为找到了真理,看到了未来,就要摆布芸芸大众,“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如何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1](35)}他们的这种理想主义,这种盲目乐观,如同《长明灯》里那个“闪烁着狂热眼光”的疯子一般,呈现出非理性状态。成为启蒙者的前提必须具有现代理性精神,而现在启蒙者自身却处于非理性状态,那么这种启蒙肯定是值得怀疑的。未经审视就照搬西方的启蒙观念,以为西方的启蒙理性可以扫除传统的一切愚昧与落后,导致的必将是非理性的狂热与偏执。“那种所有一切都可以抽取出来的理性主义信念是令人恐惧的,或者与其说是理性主义的信念,毋宁是这种信念得以成立的理性主义背后的那个非理性主义之意志的压力是可怕的”。^{[8](195)}鲁迅将启蒙者塑造成狂人与疯子,其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了。

鲁迅小说中的另一类型启蒙者是孤独者形象,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维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前一类启蒙者形象上,鲁迅批判的是启蒙者的狂热、偏执。在这一类孤独者类型中,鲁迅揭示了面对传统的威压时启蒙者的无力、无语乃至死亡。《在酒楼上》中的吕维甫,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与人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可是这个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启蒙者,10年后,却过得“敷衍、模模糊糊”。大老远从济南回来,只不过是为了给3岁时死掉的小兄弟迁坟,给邻居的女儿送两朵剪绒花;为了糊口,到人家家里去教《诗经》《孟子》《女儿经》之类的书。启蒙者吕维甫已经放弃了原来的启蒙话语,变得麻木、无聊、颓唐,成了一个得过且过的人。在《孤独者》中,作者描绘了一个启蒙者根本无法容身的社会环境。从乡村到城市,处处都奉行着虚伪的礼教;从大良的祖母到小孩大良、二良,个个都势利自私。启蒙者在这样的社会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地。“我”即使小心谨慎,还是被迫四处觅职,而又四处被驱逐。更加大胆、更具反抗性的启蒙者魏连殳,竟被逼到了活不下去的绝境。最后他将行为完全颠倒过来,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这样不仅被社会接纳,而且以世俗的眼光看来还飞黄腾达起来了。魏连殳与吕维甫一样,面对现实的威压,无奈地放弃了启蒙,选择了苟活,与黑暗的社会妥协。鲁迅通过启蒙者的失败,不仅仅是为了揭示启蒙任务的艰难,更在于否定启蒙这一行为本身。启蒙者自己尚且难于改变自己,重新

回到了启蒙前的旧我状态，又怎能拯救别人，担当启蒙任务呢！“自觉到身为奴才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它，这是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8](206)}所以像蝇子一样飞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的吕维甫、魏连受，内心都是非常痛苦的。吕维甫不断地自责，“连自己也讨厌自己”；魏连受则以打牌、猜拳、失眠、吐血，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实，魏连受、吕维甫就是鲁迅另一个自己，他们的无奈与痛苦，就是鲁迅自己看到了启蒙的无力、无效，感到了无路可走的痛苦。

狂热、偏执的启蒙者和孤独的启蒙者，最后都成了失败者，在鲁迅笔下，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启蒙者形象。鲁迅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写启蒙的失败，其实就是对他自己那一代启蒙者的否定与批判，批判他们自己启蒙头脑的偏激、狂热，批判他们启蒙的无力、无效，从而否定了启蒙的乐观憧憬，否定了解放的幻想。这种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不以啮人，自啮其身”，^{[9](208)}使鲁迅较其他启蒙者更清醒、更深刻，也更彷徨、更痛苦。当其他启蒙者认为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出路时，鲁迅却在承受着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煎熬。

竹内好认为，“新的价值不是从外面附加进来的，而是作为旧的价值更新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是要付出某种牺牲的，而背负着牺牲于一身的，是鲁迅”。^{[8](151)}面对启蒙，鲁迅从浪漫的质疑，到现实的

批判，再到对启蒙者的自我否定，对启蒙本身的价值偏颇、对启蒙观念引进中国后产生的问题、对中国启蒙者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来没有将解放的幻想寄予在启蒙上，也没有寄予在任何其他方面。他所做的就是对旧传统、旧习惯，不断地施以猛烈的攻击，目的是要催促新的产生，促进旧的灭亡，使中国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于是鲁迅主动地肩起了黑暗的闸门，放别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把自己独自留在了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9](170)}

参考文献：

- [1] (英)以赛亚·柏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2] 刘小枫. 诗化哲学[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 [3]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4]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5] 鲁迅全集(第五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6] 鲁迅全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7] 鲁迅全集(第六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8] (日)竹内好. 近代的超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9] 鲁迅全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0] 谭桂林. 鲁迅小说启蒙主题新论[J]. 鲁迅研究月刊, 1999(1): 30.

From romantic questions to self-denial: Lu Xun's reflection on the enlightenment

LI Mei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In Lu Xun's early days, standing in the position of romanticism, he criticized that human personality and mind was killed by the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Later, focusing on China's social reality, he thought about the problems of portability and illusory nature that were produced after the enlightenment value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Lu Xun also had thought about self-identity of the enlightenment, criticized the enlightenment's bigotry and fanaticism, and enlightened an impossible situation that the enlightenment was facing.

Key Words: Lu Xun; romanticism; enlightenment; A Madman's Diary; A New Life; the May 4th Movement

[编辑：苏慧]